

「一带一路」

关键词

尚虎平 / 编著

One Belt and One Road
Keywords

从碎片化信息中搜寻关键内容
解读「一带一路」是什么
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一带一路」 关键词

尚虎平 /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关键词/尚虎平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301 - 26532 - 1

I. ①— … II. ①尚…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作—研究—中国
IV. ①F12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768 号

书 名 “一带一路”关键词

Yidai Yilu Guanjianci

著作责任者 尚虎平 编著

责任编辑 朱彦 王业龙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532 - 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dyy_2005@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021 - 62071998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8.625 印张 185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 - 62756370

序 —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从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里首次明确指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完全可以成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的丝绸之路，这是习主席第一次描述“一带一路”战略的雏形。此后，习主席又在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战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2013年10月3日，习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初，习主席访问欧洲时，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再次提出中欧要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要积极探讨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同年5月15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习主席要求国内各界“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宽广

的视角”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年 5 月 21 日,习主席在“亚信会”第四次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中国一贯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年 6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主席回顾了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提到中阿之间的丝绸之路与香料之路,强调了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提出以丝路精神“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并指出中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行动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

随着习主席的不断阐释,“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逐渐明晰。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举重若轻,行云流水,熔铸古今,面向未来,立意高远却又明白如话,这与习主席对欧亚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了如指掌的知识结构有关,更与他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势的精准把握有关。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从来没有如此紧密,资源配置的半径也从来没有如此之大,推进与实现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必然要与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跨国合作的多种形式结合在一起,以地缘经济为载体,全面发展经济伙伴合作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开辟新的合作发展道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对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的战略贡献。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重大全球经济发展战略,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一带一路”宣示了亚欧曾

经的辉煌,也揭示了创造辉煌的规律。来自丝路贸易的历史与现实特征,是其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一带一路”发展是当代地缘学说的合理回归与创新,拉近了人们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的发展视野,并为规避和消解多种“全球风险”开辟了新的路径,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共同进入了丝路新时代。

“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战略,是世界发展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引领世界走出经济低谷的“破天荒”的战略。要充分、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还需要作更多的探索。2013年底,国家发改委与外交部共同召开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学习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深刻内涵。2014年5月,甘肃省与外交部共同举办了“亚洲合作对话丝绸之路务实合作论坛”。同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进一步挖掘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层意涵。同月20日,中国社科院为了能够深入、扎实、细致地廓清“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外延,成立了“一带一路”的专门研究机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地”。

尽管我国各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但是从社会反响来看,这些解读和阐释似乎依然未穷尽所有大众关心的问题。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也应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它本身也属于进一步阐释“一带一路”战略的探索。尽管从出版社的反馈来看,该书销售情况良好,社会反响也还让人满意,但是它也还只是洞察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部分真谛,还有大量未尽事宜需要

各界同仁进一步探索。

尚虎平先生年轻有为,作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华社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教育部高职高专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他专注于政府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公共管理理论前沿研究,学术功底深厚,著述颇丰,并主持了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他在进一步探索“一带一路”战略真谛过程中作了有益的尝试,通过 105 个关键词,阐释了“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在具体探索中,每个关键词都对应着一个“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问题。通过这种较为通俗、易于理解的方式,本书进一步展示了“一带一路”中容易被忽视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解读方式有些雅俗共赏、童叟皆宜的味道,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在更广范围内的影响力,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就此而言,本书是一本好读却不乏内涵的“智慧”书籍,值得关心“一带一路”战略的读者花点时间读一读。

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
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博采国研公共管理信息研究院(北京)院长
冯并
2015 年 11 月 6 日

序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转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显现,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十分严峻。为助推世界经济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即“一带一路”,探索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随着“一带一路”被确立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公共管理学界迅速跟进研究。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尚虎平教授编著的《“一带一路”关键词》一书,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一次有益探索。

本书虽出自学者之手,但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既有对“一带一路”基本内容的阐述,又有对背景资料的介绍,好读易懂,深入浅出,适用的读者群体比较广。本书以 105 个关键词作为重要话题的“引线”,导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资料、数据、史实,引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给人很强的新鲜感,便于读者把握“一带一路”的热点、

“一带一路”关键词

重点和难点,了解世界、国家与地区,城市与农村,以及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层面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和内涵。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对一般经济领域的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而且重点关注经济学研究、国际战略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作者结合自身公共管理学科的背景,对其他学科研究的“盲点”进行跨界别、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使得其解读和阐释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前瞻性。这种写作技巧以及所形成的风格很有特色,非一般专业作者所能很好掌握。这样做,在读者那里得到的益处是,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掌握“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群体进行交叉型学习,增进相关的各类知识,获得更多的智慧;同时,对于国家传播“一带一路”战略思维及相关政策而言,有助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扩大“一带一路”在不同群体内的认知度、熟悉度和参与度。

另外,本书在编写、装帧、印刷等各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质量,也是难能可贵的。

公共管理研究不能局限在传统的行政管理知识领域,必须以满腔的社会责任感,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追求国家发展和治理绩效的提升。本书作者没有局限于学科的“领地”,积极介入重大发展战略与公共治理的结合型研究,为创新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样的研究行列之中。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

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会长

高小平

2015年11月8日

序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应邀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重要演说，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次演讲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此后，我国逐渐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达成了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意向。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重点介绍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以及中国相关省份的开放态势与战略地位，标志着“一带一路”从战略意图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众所周知，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形成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是交往。个人如此，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国家亦如此。可以说，交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众多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着一个国家的

“比较优势”。只有在交往中，一个国家才可以奠定自己相对于别人的地位，才可以确定自己属于“领导者”还是追赶者。不管承认与否，这都是国际关系变动的基本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承认并遵从这种规律，坚决“走出去”，以便在交往中获得主动地位，在国际上构建自己的“朋友圈”。如果不主动为之，我们就会陷于被动。

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中国，比如汉唐时代，都是积极与国际交往的时代。汉代时，中国直通西域甚至更远，甚至在古罗马都可以买到来自中国的丝绸。据一些史料记载，古罗马皇族常常炫耀自己的丝绸马褂，以显示身份的尊贵。唐代时，中国广交朋友，与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交往，一时之间形成了“万邦来朝”的局面，“天朝大国”的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了起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拒绝与世界交流的惨痛经历，“片板不许下海”式的与世隔绝最终使得中国脱离了世界发展轨迹，逐渐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抓住二战后短暂的国际稳定局势，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敌视新中国的发达国家积极沟通交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审时度势，积极推进主动、积极与国际交往的开放政策，广交朋友，广纳“朋友圈”的发展智慧、建设资金，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世界上的地位大为改观，逐渐成为全球体系的引领者之一。

究其本质而言，“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洞察国际交往规律基础上作出的“走出去”的国家级战略、全局型战略、时代性战略。说它是国家级战略，是因为国家将动员、吸引各个地方政府、各界社会人士、各类物力财力投入“一带一

路”的建设,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说它是全局型战略,是因为“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举措,而且是关于我国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的外交战略,也会对我国的地缘政治、军事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说它是时代性战略,不仅因为“一带一路”是我国古代丝路精神即对外和平交往精神的延续,还因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虽然大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性有着一致的认识,但是对它的内涵、外延却不甚了了。对于何谓“一带一路”,如何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各界、各地甚至存在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问题。为了能够完整、深刻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学界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种探索更多是由从事国际关系和经济学研究的从业者展开的,他们要么秉持“马汉原理”推演“一带一路”,要么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解释“一带一路”。虽然这些解释都不乏深刻的道理,对未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也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但是难免有所缺憾。毕竟,“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公共战略”,需要围绕我国“公共利益最大化”作出努力。就此而言,要全面理解“一带一路”战略,还应该倾听一些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声音。

我们学院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导师尚虎平教授一直较为重视跟踪国家发展的最新动态,力图能够将近年的研究成果重点应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新问题、紧迫问题,从而使科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服务于我国公共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他所编著的《“一带一路”关键词》一书从公共管理研究者的角度,把握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应该聚焦的“关键词”,进一步阐释了在这些

“一带一路”关键词

“关键词”背后所应该掌握的知识、解决的问题。通读本书后，我发现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从形式上看，它汇集了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外延和来龙去脉的 105 个关键词，并对每个关键词作了具体说明；从行文上看，它摆脱了艰涩的学术语言，力求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讲透“一带一路”中的各种问题，对于普通大众、基层领导干部、普通企业员工来说，可读性强，易于理解；从内容上看，它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历史、艺术等多个方面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使读者能“无死角”地、系统地了解“一带一路”的过去、现在、未来，了解“一带一路”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从资料来源看，它吸取了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记者、国外友人、国外政治家等不同从业者对“一带一路”的诸种认知，并将其以通俗的语言编纂成书，便于读者在不掌握各方面专业信息、内部信息的情况下，从多维度理解“一带一路”战略。

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任何关于“一带一路”的叙述和论说都是有限的，本书也不例外。不过，这种有限性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公共管理研究者看待“一带一路”战略的崭新视角，使对“一带一路”战略感兴趣的读者能够“兼听则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金太军
2015 年 11 月 6 日

前　　言

我一直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公共管理学科应该承担与自然科学类似的功能,它应该通过努力揭示我国公共管理规律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实践都应该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然而,近年来,我国大学的评价导向有些走向了极端,判断一项公共管理研究是否成功、取得了多大成功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发表在国外的 SCI、SSCI 期刊上。尽管走向国际化也是公共管理研究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将此作为唯一目标,就忽视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最关键的诉求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

实际上,我国对读书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古训,强调的也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它指的是,读书人在研究学问、实践学问的过程中,需要能够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解决国家的难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导向,因为解决国家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的过程就是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过程。比如,“文革”甫一结束,在全国人民还深陷“两个凡是”不能自拔的时候,南京大学胡福明先生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全国人民冲破认识迷雾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正是这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摆脱了“两个凡是”的羁绊，以踏踏实实的态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胡福明等人的研究成果，可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我国社会上存在的重大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正是在胡福明等人的研究成果促动下，全国人民开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此之后不久，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就开始了探索承包到户的实践。鉴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田到户做法契合了当时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党中央在深入调研了小岗村的做法之后，开始在全国实施包产到户的改革。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逐渐过上了好日子。可以说，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与胡福明等学者“眼睛向下”，追求以公共管理研究造福我国民众、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研究旨趣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学术担当对解决我国现实问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以为，这种公共管理研究的学术担当，值得当代每一个公共管理研究者学习。

当前，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界，不少从业者在国外 SCI、SSCI 评价导向下，逐渐开始以满足国外学术标准为追求的公共管理研究。这种导向对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价值，也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渐了解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是怎么进行的、有哪些突出问题。这对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也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潮流。但是，严格来说，符合国外标准未必就是真正洞察、揭示了中国公共管理规律，解决了中国公共管理

难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可能只是满足了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偏好的研究。当代美国政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就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假定公共行政学能够摆脱背景条件的影响,或它是某种独立或孤立于它所有发展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必须变成一门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科,不应将它束缚在一种狭窄地界定了的技术知识和过程之上,而必须扩展到变化着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其他的条件因素上(这些因素给每个国家的公共行政学打上特殊的印记)”。他所强调的本质上也是公共管理的特殊性,即不同的国度,由于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因素的差异,必然有着与其他国家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异的公共管理规律。一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应该将最主要的精力用于探索、发掘、廓清本国的公共管理规律,唯其如此,才能使本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转化为促进本国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工具。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应该致力于揭示中国管理情境下独有的或者与其他国家相同但作用机制不一样的规律,这样才能解决我国改革实践中碰到的各种难题,才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诉求。

我认为,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应该多一些国家情怀,少一些私心杂念。既然选择了研究“公共管理”,就应该有一些公共情怀,有促进中华民族“公共善”的情怀。对一个后发展国家来说,当前最大的“公共善”就是促进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进步,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的整体进步。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不仅要谋划发表SCI、SSCI这些可以为从业者个体带来各种物质和精神利益的研

究,更要谋划对那些国家重视的疑难问题的研究,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的进步做出微薄的贡献。每个研究者都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一点点力量,哪怕只是贡献一个创新词汇,贡献一个小的创新性思路,贡献一个小的政策工具,贡献一个小的管理措施,编制一个小的管理案例等,都会对改进我国的公共管理现状、推动我国生产力的微小进步有所助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通过每个公共管理研究从业者的努力,最终会促成我国公共管理天翻地覆的变革与进步,并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达到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进步,最终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我国的科研政策迟早会转到重视以科学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上来。实际上,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举行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了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这是要求我国科学研究服务于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改变评价方式的先声。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我国今后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专辟一个部分阐述了我国科学研究改革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无论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大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它们对科学的研究的导向都是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让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这在本质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原理。只有符合生产力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科学技术研究,最终才是社会需要的。

令人欣喜的是,触及公共管理领域的一批研究者有了越来越